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薪火映黔山

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开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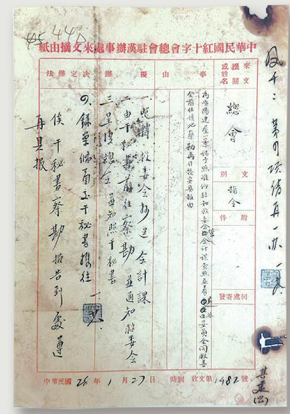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

贵阳图云关抗战风云

文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拟赴贵阳的相关影印件。

“顷奉、总干事谕：本会于月内移筑……”走进位于贵阳市南明区嘉润路8号的贵州省档案馆，一份签署于1939年1月17日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关于拟在贵阳建屋会同救护委员会前往查勘发给该会临时办事处的指令”，揭开一段尘封80余年的抗战往事——贵阳图云关曾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全面担负起战场救护使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辗转入黔

图云关位于贵阳城东，始建于宋宁宗嘉泰元年，原称图宁关，为出黔去湘桂的咽喉要隘，人称“黔南首关”。自古以来，驻军关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

1931年，日本策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1937年7月7日炮轰宛平城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中国人由此进入全面抗战。彼时，山河破碎，战火连连。

1937年12月6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连同其他机构整合医疗救护资源，在汉口成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委员会，并在华北、淞沪、南京等战场积极开展战地救护工作。

翌年6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改组为救护总队，由爱国华侨医学家林可胜任总队长，并组织100多支高效灵活的医疗队，深入各战区前线，全面担负起战场救护使命及后方平民防疫等公共卫生责任。

随着日军占领扩大，救护总队一路西迁，由长沙经邵阳、桂林、柳州、河池、独山、都匀、贵定，最终于1939年3月初迁至贵阳图云关，这里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成为战时最佳庇护所。为了加强战地救护、医疗、医药等工作，医疗大队增加到9个，共辖47个中队、94个区队、9个手术队。预备大队设在贵阳，下辖10个中队，供机动使用。资料显示，1942年救护总队鼎盛时期，图云关工作人员达2000多人（不含卫训所人员），以高、中级医务人员为主，其中有医生500人左右，护士数百人，还有药剂师、检验员等各种卫生科技人员及后勤工作人员1000多人。

“救护总队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战时医疗救护组织。众多爱国医务工作者不畏艰苦的生活条件，不计待遇，主动参加救护工作。”贵州省党史研究室决策咨询处处长朱仁印介绍，救护总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作是随着战地救护的需要逐步发展起来的，其工作宗旨是以深入战地，辅助军医救治伤员入手，以协助发展战区防疫保健，保障部队战斗力为主。由于救护总队的工作重点是救护伤病员，当时设立的行动口号是“救死扶伤，博爱恤兵”，还对所有工作人员订立八条救护信条。

救护救助

“救护总队驻扎于图云关期间，数十名外籍医生和数千名中国医务人员一起，集合在图云关，又被派往各个战区。”图云关抗战纪念馆运营负责人商梦娇告诉记者，他们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不分国籍和肤色，积极参加中国的战地救护服务工作，为争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胜利，无私奉献着自己的医学知识和技术。

1940年至1941年，不少沦陷区的医务工作者，以及一批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基于抗日救国之热忱，冒着生命危险，潜离敌占区，辗转来到位于贵阳图云关的救护总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救护总队主持滇缅印战区中国远征军战地培训和救护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医疗保障。

“救护总队不仅救护抗日将士，而且协助驻地的地方卫生防疫部门扑灭当地疫情和开展环境卫生、防疫防病工作，并开设门诊部为平民百姓提供医疗服务。”朱仁印说，1942年，救护总队在贵阳图云关和大西门的社会服务处内开设两个诊疗所，为贵阳市民看病治病，收费低廉，就诊人数众多，很受百姓欢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贵阳图云关沸腾了。人们一下冲到户外奔走相告，欣喜若狂，热泪盈眶。没有锣鼓他们就以脸盆代替，没有高音喇叭就用嗓子高呼，有人还把洋铁桶搬到空地上猛敲。国际援华医生队员们更不顾礼仪，见人就拥抱。他们摄影留念，签名赠言，以纪念这难忘的一刻。

守护研究

据学者研究，抗战期间，贵州民众组织战地工作团，深入战地救护和宣传，协助中国红十字会在贵阳，负责分发国际红十字会及国际援华医疗物资。

据统计，从1938年1月至1945年10月，救护总队共进行手术119836人次，骨折复位35522人次，敷伤8784731人次，住院治疗2142997人次，门诊军人2481685人次，门诊平民2002996人次……

2005年以来，包括杨永植在内的图云关救护队后人开始收集整理相关档案。2013年，“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纪念碑在贵阳市森林公园落成。2017年，国家批准在图云关建设“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

据统计，目前，贵州省档案馆、贵阳市档案馆共藏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档案4098卷。贵州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档案是目前发现的体量庞大、内容系统的救护总队抗战救护档案史料。图云关抗战纪念馆陈列着的实物有100余件，图片453张、文献资料28万份。

这几日，杨永植和美国等地的图云关救护队后人紧密联系，并邀请大家于8月底来贵阳参加相关纪念活动。他们正计划着将散落在中国、美国、英国等国，香港、台湾等地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杨永植说，希望尽自己最大努力把一手资料收集起来，既为历史存证，也为后世研究者留下更多资料。

盛夏时节，位于贵阳城郊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绿树成荫，园内耸立着一座国际援华医务工作者纪念碑，碑上镌刻着白乐夫、严斐德、纪瑞德等48位外国医生名字。纪念碑不远处，英国女医生高田宜长眠于此。

抗战时期，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外籍医生的故事得从西班牙内战说起。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共产国际组织了一支“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一起反抗法西斯势力。德国医生白乐夫与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便是其中一员，他们也因此被称为“西班牙医生”。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在英国伦敦成立“国际医药援华会”，主要任务是向中国提供医师、医疗器械和药品，援助中国抗战。



外籍援华医生在图云关合影。

跨越国界80余年的友谊

文\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赵相康

“我准备捐赠父亲的两枚中国印章，其中一枚上有乔治·沈的字样，另一枚有沈恩的汉字……”8月11日，居住在比利时的“西班牙医生”沈恩的后代皮特，通过微信告诉图云关救护队后人杨永植，说他将来贵阳参加相关纪念活动。

杨永植与其他图云关后人的友谊源于20年前的一通电话。

2005年，周寿恺之女周茜为追寻父亲生平足迹，在查阅档案时发现了杨永植父亲杨锡寿撰写的怀念文章。几番联系后，两位抗战期间图云关救护队的女儿在贵阳相聚，由此相识。

贵阳图云关一段段被尘封的历史由此逐渐清晰：抗战时期，图云关是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驻地，杨锡寿作为中正医学院毕业生，跟随著名医学大家、时任救护总队内科指导员周寿恺一起工作；沈恩等“西班牙医生”辗转来华支援抗战……

杨锡寿是湖南人，新中国成立后，他选择留在贵阳，并参与医疗系统的建立。由于父亲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战救护工作，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让杨永植决心要挖掘这段历史，把救护总队在图云关的贡献说给世人听。后裔的故事越挖越多，循迹而来的医疗队后人也越来越多。

“许多后人仅知道父辈曾在图云关工作，却对具体经历知之甚少。”但只要有人来贵阳寻找，杨永植就会和他们一起查阅档案、寻访遗迹，一起拼凑父辈在战火中救死扶伤的点滴故事。

《中国日报》曾在海外版刊发图云关专题报道，“西班牙医生”孟乐克的孩子在美国读到图云关故事后深受触动。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他组织了30多位来自多个国家的医疗队后裔来到贵阳，成员包括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的英国与牙买加后裔、波兰医生亲属、德国、罗马尼亚医生子女，以及中国医护人员后人。

林可胜的外孙女准备从英国捐赠20世纪30年代祖辈的奖杯与勋章，后经台湾的医学教授何邦立捐赠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以下简称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珍藏。

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国各地及匈牙利、英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后裔，循着先辈足迹来到图云关。跨越国界的“寻根”之旅，逐渐汇聚成传承抗战精神的国际友谊。

在这期间，国内图云关救护队后裔建立了微

这里有一群“白求恩”

文\图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相康

1939年初，“国际医药援华会”招募了一批自愿来中国服务的医务人员，白乐夫与奥地利医生严斐德、捷克医生纪瑞德踏上从英国利物浦出发前往中国的货轮。其后，还有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奥地利医生富华德等医生，先后奔赴中国，白求恩则先于白乐夫抵达中国后前往延安。

作为共产国际战士，白乐夫和严斐德在抵达贵阳后，曾前往重庆找周恩来，希望能去西北参加抗战。在国共合作抗日背景下，周恩来对两位医生说，只要是在中国，在哪里都是一样帮助中国人民抗战。

贵阳图云关条件艰苦，外国医生们与中国医护人员一起，住茅草屋、睡竹板床、吃糙米饭。前线工作环境极端艰苦，病房、手术室十分简陋，药品和医疗器械供应也成问题。

记者在留存影像和资料档案中看到，在救护工作中，一把小刀、一个钳子和几个血管钳，往往就是一台手术的全部器械。至今仍有不少当时的医疗器械陈列在纪念馆内。

尽管如此，援华医生们努力救治伤员，扑灭疫病、培训军医。

罗马尼亚医生柯让道用石灰和硫磺调制经济涂剂，先后治愈了大量疥疮患者；奥地利医生严斐德就地取材建立竹子医院，用竹子搭起简易手术室和手术台；德国化验员孟威廉在缺乏自来水和器皿的情况下，自制实验器材，取得化验工作重大进展；奥地利医生富华德在军营里推广注射霍乱、伤寒和天花疫苗，举办卫生讲习班，培训前线人员如何进行包扎、如何急救……

和白求恩一样，不少外国医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英国籍女医生高田宜于1941年随“国际援华医疗队”来到贵阳。1942年3月，救护总队将派一支队伍前往浙江，摸底当地鼠疫爆发的情况。高田宜不顾身体不适，在启程前冒险接种鼠疫疫苗，引起严重过敏反应，以身殉职，长眠图云关，时年31岁；罗马

尼亚女医生柯让道夫人也在防疫工作中不幸染上回归热，于1943年殉职于昆明；罗马尼亚护士柯芝兰因感染伤寒，牺牲在云南建水前线；奥地利医生王道因积劳成疾牺牲在重庆……

“前后共有21位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外国医生来到中国支援抗战。”多年来，一直在追寻这些医生足迹的旅美华裔科学家邹宁曾回忆说，这些医生大都是共产党员，来自德国、波兰、保加利亚、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国。

匈牙利籍医生乔治·沈恩是“西班牙医生”之一，战争中，他与中国姑娘朱瑞玉结为伉俪，携手救治过众多中国伤病员。抗战胜利后，一些外国医生陆续回国，白乐夫、严斐德、柯让道等人则受聘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留在中国继续当医生，乔治·沈恩则回国从事中匈友好工作。

曾在救护总队学习工作过的杨锡寿与几位外国援华医生有过接触，杨锡寿女儿杨永植回忆说，“我小的时候，父亲就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外籍医生的故事。这些外籍医生很有理想和抱负，他们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救治了大量的伤病患者。”

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运营负责人商梦娇介绍，这些外国医生不仅能迅速适应贵阳生活，还特意给自己起了中国名字。

多年以后，在德国小城迪尔哈根，“西班牙医生”之一的罗尔夫·贝克尔曾回忆自己的中文名字“白乐夫”时说，“我姓白，白求恩的白。”

据考证，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除“西班牙医生”外，还有数十位世界各国前来参与中国抗战的外籍医生。

正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2025年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些曾经战斗在图云关上的“白求恩们”值得永远铭记。

国际援华医务工作者纪念碑

国际援华医务工作者纪念碑。

记者手记

观众参观纪念馆。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蔚 摄

历史终将铭记

赵相康

记者曾偶然得到一组拍摄于80年前的贵阳老照片（电子版），其中一组关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照片，涉及假肢厂、伤员救护、物资运输等内容，令人印象深刻。

时隔多年，当记者因为采访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新闻选题走上图云关，看着纪念馆玻璃柜内陈列的手术钳和泛黄档案，读着救护总队的救护故事，深刻感受到这个战时中国最大的医疗“心脏”，至今仍跳动有力。

盛夏的山林浓翠如墨。纪念馆内，有爱国华侨医学大家林可胜率领队伍跋涉千里到图云关，初创“流动救护”的相关物件。纪念馆外“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上，48个异国姓名在阳光下闪烁，奥地利医生严斐德用竹竿搭建手术室，罗马尼亚的柯让道调和石灰治愈数千疥疮病患，英国女医生高田宜的墓碑静卧林间……泛黄照片里那些深邃眼眸真挚热烈。

80多载光阴未能侵蚀那些异乡姓名，反将“白乐夫”们那句“我姓白，白求恩的白”淬炼成永恒。他们用柳叶刀在烽火中刻下答案：仁心无界，救死无疆。

山风掠过，吹动着纪念碑前新献的白菊。历史终将记住，贵州为救护总队提供的支持与庇护，贵州民众参与伤员转运，与救护团队一起分发国际红十字会及国际援华医用物资，为抗战胜利作出的历史贡献。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赵怡
版式设计：邢瑞平 陈欢欢